

敦煌的百岁老人

张 岚

孙儒僊先生今年一百岁了。在守护敦煌莫高窟的漫长岁月中,他的生命与这座石窟血脉相连。

最初知道孙先生,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。那时,大学学长柳廷信因才华出众,从张掖市文联调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。交谈中得知,他的夫人孙晓华在甘肃省卫生学校(现甘肃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)工作,而岳父母则是敦煌研究院最早的一批老专家。那时我只闻其名,未见其人。

2004年9月,得知孙先生因病手术,我前往医院探望。他刚从手术室出来,麻醉未醒,在病床上沉睡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,也是唯一一次。

2004年10月,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栏目以“东方之子,守望敦煌”为题,报道了孙先生与夫人李其琼。看了节目我才知晓,孙先生是一位融建筑学、敦煌学、美术学于一身的学者。李其琼老师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美术工作者,毕生致力于壁画临摹,作品达154幅、120多平方米,曾任敦煌研究院任美术研究所副所长。夫妇二人一生守在大漠,生活质朴,学术精深,名贯中外,令我肃然起敬。

2019年2月,上海东方卫视《闪亮的名字》节目再次播出对孙先生的采访。李其琼老师已于2012年离世。镜头中的孙先生,言语平静却力量千钧。他与妻子用一生守护敦煌,不离不弃,节目组成员在拍摄中几度动容,观者亦为之泪下。

孙儒僊,四川新津人,生于1925年10月,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。1947年,应常书鸿之邀,他辞去优厚工作,从四川出发,历时近一月,辗转抵达敦煌,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(敦煌研究院前身)第一位建筑专业人才。

从设计建造研究所第一座陈列馆开始,孙先生的一生便与敦煌融为一体。数十年来,他筚路蓝缕,开展洞窟测量、绘制解剖图、编号整理、壁画临摹、防沙治沙;他参与建设水电站,主持工程地质勘查,设计并实施大规模石窟加固工程;更参与推动莫高窟申报世界遗产。每一项工作,都成为莫高窟保护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环。

他倾注心血于壁画与塑像保护、古建筑研究、唐宋窟檐测绘等关键领域,主持多项石窟加固与减灾工程。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专业能力,更需远见、魄力与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。正是这些扎实的工程,奠定了莫高窟延续至今的根基。

此外,他还参与天梯山石窟搬迁,主持炳灵寺、麦积山、马蹄寺、塔尔寺、瞿昙寺等多处文物的加固维护,可谓中国石窟保护的先驱与开拓者。

作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,他曾任院党委委员、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保护研究所首任所长等职,也是多项国家级文物专家组成员。他多次赴日本交流,传播敦煌艺术。本应1993年退休的他,直到2005年才真正离开岗位。

令人敬佩的是,73岁高龄时,为撰写《敦煌艺术全集——石窟建筑卷》,他开始学习使用电脑,并陆续完成《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》《莫高窟壁画中的古建筑》等多部重要著作。

可以说,莫高窟、榆林窟、西千佛洞,乃至研究院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,都深深印在他的生命里。

我多次到访莫高窟,在窟区徘徊时,虽难直接见到孙先生留下的痕迹,但他一生的奉献,如同大泉河的流水,静默却熠熠生辉。

2004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》,我渴望一阅。柳兄夫妇遂赠我一册。画册封面与扉页皆有孙先生题字,笔法流畅自如,令我难忘。这份礼物,我珍藏至今。

多年来,虽渴望登门拜望,亲聆教诲,但念及孙先生年高,访客众多,终未成行。然

而因柳兄这层关系,我对他总怀有一份亲切之感。

得知我热爱敦煌文化,孙先生晚年欣然提笔,赠我“琴声雅韵”“飞天神女迎宾客,琵琶起舞换新声”等墨宝。他的字古朴厚重,笔力遒劲,我常静心观赏,沉浸其中。

几年前,我打算印刷一本小册子,想用孙先生所题字迹作书名。因自觉文笔稚嫩,踌躇许久,终托柳兄转达。他得知,欣然应允。这份对后辈的鼓励,令我倍感温暖。

2023年3月,柳兄发来一段视频:98岁高龄的孙先生伏案握笔,手虽微颤,却极认真地在口述史《菩提树下》扉页上为我签名。此时的他虽体弱视朦,字迹却依然工整有力,笔意灵动,可见其精神不减。观看视频,我心中充满感动与敬意。

细读《菩提树下》,方知先生与夫人从青年求学至踏上敦煌,将一生交付莫高窟。他历经动荡岁月,承受不公待遇,动了两次癌症手术,又接连面对儿子与夫人的离世,却始终以非凡的毅力坚守敦煌,为石窟保护事业砥砺前行。读罢,心情久久难平。

百岁的孙儒僊先生,是敦煌研究院目前最年长的前辈,也是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、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三个时期的唯一亲历者。



深中通道日出风光

广东中山,当晨光刺破海面,深中通道索塔的钢构被染成金红色,斜拉索在霞光中编织出光的琴弦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李远芳

某日出门诊时,一位村民问我:总是拉肚子,可以煮“老鸦酸”来吃吗?我愣了一会儿,才想起,我们惠州人把酢浆草叫“老鸦酸”,老鸦指的是乌鸦。在广东,还有叫它“鵝鴛酸”的。此外,听说有的地方叫它“斑鸠酸”。酢浆草的根茎是酸的,我小时候嚼过,名字里的“酸”不难理解。可是,为什么它的三个俗名里都有鸟类呢?是否因为叶片的形状像鸟的翅膀?我至今没有弄明白。

从接触中药学的时候起,我就发现,不管学名还是俗名,草药的名字总是可亲可爱的。比如药食两用的马齿苋,我们叫它“老鼠耳”。马齿苋、老鼠耳,都是以叶子的形态来命名的。它的叶片扁平、小巧,呈倒卵圆形,很像马的牙齿,又很像老鼠的耳朵。马齿和鼠耳,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,竟被用来指代同一种植物的叶子,想想真是既奇怪又合理。

再说家喻户晓的鱼腥草,客家话叫“狗贴耳”,四川方言把它的根叫“折耳根”。鱼腥

草,是以气味来命名的。吃过它的人,一定忘不了那股独特的鱼腥气。狗贴耳、折耳根,是以叶子的形态来命名的。它的叶片末端尖尖,呈卷折的心形,俨然一只狗耳朵。

金樱子,我们叫“糖罌子”,罌子就是大腹小口的瓦罐。别处也有叫“糖罐子”的,含义相似。顾名思义,糖罌子外形似罐子,味道甘甜。如此甘甜,自然要长满刺来保护自己。因此,我们又叫它“糖罌籬子”——带刺的糖罐子。作为野果子,它成熟后色泽金黄,缀满山间溪旁,给我们留下了甜蜜的童年回忆。晒干后,又成为一味难得的“甘口良药”,让人免受苦味的折磨就治好了病。就连患有遗尿需要服用它的小儿,也无须家长强灌,自己端起汤碗就喝下了。

益母草的名字更多。其一为“益母草”,以功效命名,有益于女子。虽也可用于男子,终归是女子用得更多。其二为“九重楼”,以花的形态命名。淡紫红色的小花围成一圈,重重而上,形似塔楼。其三为“笼床秆子”,指的也是花穗,一层层,的就像蒸糕点的笼屉。其四为“茺蔚”,意为充盛密蔚。记得有年初春,妈妈在老屋后随手撒下一把益母草种子,就去了城里。等夏天回来一看,齐膝的青草竟已郁郁葱葱。

益母草还叫“坤草”。正是那年夏天,妈妈望着那片益母草,感叹道:真是贱生。她说的贱生,并非贬义,是指植物无论在多恶劣的环境下,都能繁茂生长。行医数年后,再回想起这个场景,感触颇深。这种其貌不扬又极

具生命韧性的植物,不但像女子一样生长在大地的各个角落,还消除了多少女子的病痛呢。乾为父,坤为母。坤草,意即大地之草、母亲之草。这样“大”的名字,安在它身上,却一点也不为过。

讲起来,草药好听的名字太多了。以时间命名的,有夏枯的“夏枯草”,忍冬的“忍冬藤”;以形态命名的,有茎节膨大的“牛膝”,白丝披散的“白头翁”,断面渗出红汁的“鸡血藤”;以功效命名的,可以防风的“防风”,可以明目的“决明”;以颜色命名的,有红的红花、赤芍、丹参,黑的玄参、黑丑、墨旱莲,还有青蒿、黄连、白芷、紫菀;以滋味命名的,酸枣仁、甘草、苦参、细辛,酸甜苦辣应有尽有,甚至有“五味子”,我曾因好奇尝过,真是五味杂陈的。

村子里找了整整一天,田埂上、池塘边、小山坡,都没有它的身影。乡亲们说,早上看到它朝着母亲坟地的方向跑了,跑得很快,像是在追赶什么。

后来,村里人再也没见过阿黄。有人说它可能跑到山里迷路了,也有人说,它大概是找黑虎去了。我更愿意相信后者,或许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,它和黑虎又团聚了,继续守护着母亲。

如今,每次回老家,我都会去母亲的坟头看看。坟头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黑虎的小土堆上也长满了细密的青草。风穿过树林,在山间发出呜呜的回响,像极了当年阿黄和黑虎的哀号。我常常会上母亲生前用过的那只铝合金大碗,装上一些食物放在坟前,仿佛这样,母亲就还在,黑虎和阿黄也还在,它们依然会围着母亲,等着她温柔的呼唤。

那只大碗早已斑驳,可我总是觉得,在某个寂静的午后,还能听到两只狗争抢食物的欢叫声,还能看到母亲坐在小马凳上,笑眯眯地看着它们,阳光洒在她的身上,温暖得像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梦。而那梦的头,是母亲温柔的笑脸,是黑虎摇着尾巴的欢快,是阿黄依偎在脚边的恬静,更是我一生都回不去的从前。

康宁古街记

朱小平

康宁古街是源远流长的图书制作古街,曾以雕版印刷闻名于世,世称“建本”。原康宁古街两侧商号林立,是古代中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。刻书业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,绵延近千年,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皆曾在书坊刻印上市,一时车水马龙、喧闹繁华。

我年轻时对版本学有浓厚的兴趣。十七八岁时在中国书店花一角钱买了一本《古籍版本浅说》,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版。我不喜别人读过的旧书,此书是出版社的存货,仅纸微黄。后来放弃这一兴趣,因为除非在大图软馆善本部工作,否则难以接触到真正的善本。不过了解版本常识,写文章时,知道引用文史资料使用何种版本可靠。还有一个收获是无师自通,通过研究清末民初的线装书,包括拆开外祖父送我的清末坊版《芥子园画传》,可以手订自己书写的诗词册帙,仅此而已。

所以来建阳,对“建本”是有记忆的。版本分两类,官刻本含有监、经厂、殿、内府、局各种刻本。私刻本有家、闵、毛刻本。最后一类是坊刻本,校刻不精。就宋本而言,分蜀、闽、浙、婺四种。闽本即建本,又称麻沙本。

我从建阳归京,又查了书中对建本的简洁定义:“建是指福建的建宁府和建阳县而言。”这两个地方所刻的书,统称为建本,又称为闽本。麻沙镇附近多产榕树,木质松软,麻沙人多取它雕版印书,因此称为麻沙本。麻沙本在未版书中,舛误较多,不为世重。如《石林燕语》(卷八)说:“天下印书,以杭州为上,蜀本次之,福建最下……福建多以柔木刻之,取其易成而速售,故不能工。”不过需要指出的是:官刻本是为官方及少数人服务的,而建本等则为广大数下层读书人所接受,拥有更广泛的受众。

清代大名士查慎行就来过此地,大概也买过书。他有《建溪棹歌十二章》,其四云:“西江估客建阳来,不载兰花与药材。点綴溪山真不俗,麻沙村里贩书回。”何其情趣盎然!

书本上的知识不能直观。但书坊街里有文化体验馆,印书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人物塑像模拟:备板、写样、刻板、校准、印刷、装帧等,可以真切地看到古时工匠、文人的劳作过程。那一块木板、一张宣纸、一支毛笔,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和文化,使我不禁怦然心动。参观的人甚至可以亲手体验印制过程:调墨、各纸,先用刷子蘸墨,在雕版上将墨刷匀,用白纸覆在板上,再拿干净刷子纸背上轻刷,将纸揭下,印好的书页即完成。多么美妙的体验,在油墨的香气中,历史的沉淀依然鲜活,依然焕发出建本的生命延续。

绿蔓如藤

张燕峰

“绿蔓如藤不用栽,淡青花绕竹篱开”,宋代诗人陈宗远的这句诗传神地描绘出牵牛花的生机盎然,具有浓郁的野趣。

时近中秋,曾无比繁盛绚烂的夏花听从季节的召唤,收起美丽的花容,匆匆启程,踏上一条无可逆转的衰败零落之路。但牵牛花还高昂着头,迎着瑟瑟秋风微笑,自信而骄傲,恬静而从容。

当我在公园僻静的角落散步,走着走着,在低矮的树丛中看见了牵牛花的张张笑脸。怀着与老友相见的喜悦,我停下脚步,仔细地打量她们的容颜。圆润的脸盘,透着喜庆,一派天真。岁月轮转,人世沧桑,我鬓角的尘霜已然触目惊心,但牵牛花年年相见,年年纯真,美丽如故。

牵牛花大多野生,少有人去种植。清风和飞鸟把她们的种子传播得到处都是,种子落到哪里,就在哪里生根发芽,长出曼妙柔韧的藤,开出鲜艳美丽的花。她们不择地势,不惧干旱,无论是粪土之上,还是废墟之下,无论是参天大树的枝头,还是矮矮的灌木怀抱,无一不是她们奋力生长的乐土,无一不是她们自由绽放的家园。

我仍记得,多年前,我坐火车进京。快到丰台站时,有一堆粪土,还布满石块和瓦砾。令我吃惊的是,这堆粪土向阳的一面居然开满了牵牛花,五颜六色,好像这些花朵在争先恐后地赴一场庄严的生命之约,在举行一场盛大欢乐的集会。在那一刻,我旅途的疲惫被一扫而光。

牵牛花不是富贵名花,也不是文人雅士案头的风雅清供,她来自山野,带着泥土的芬芳气息,带着苍茫大地和广袤天空赐予的浩大自由的气质,质朴无华,洒脱不羁。她活得单纯而热烈,浪漫而深情,她大大方方地展示自我,既不留顾右盼,也不相互攀比。

牵牛花,这些长在藤蔓上的花朵,清晨开放,中午凋谢,花期短暂,可那出尘脱俗的超然气韵,让我情有独钟。

我为子孙下厨房

邹明强

记得20世纪70年代,有首歌是《我为革命下厨房》。那时爸妈工作忙,尚是学童的我,经常哼着这首歌炒菜做饭。不一会儿的工夫,我就把茄子、青菜炒好,和着煮好的米饭,让全家人一扫而光。虽然缺油少盐,可吃得有滋有味,至今想念。

40多年过去了,我也退休了。我又哼起了这曲子,把词改成了“我为子孙下厨房”,乐呵呵地重拾“少油少盐”的厨艺,让全家人开心用餐。

现在什么都不缺,为何要少油少盐?孙子不到3岁,按发育规律,餐食必须少油少盐;我们夫妻俩年过六旬,消化功能减退,医生建议少油少盐;儿女从事健康研究,建议用餐少油少盐。这样一来,少油少盐成为我家厨房的主旋律。

少油少盐如何让餐食有滋有味呢?这可得想办法。我是湖南人,喜欢吃腊肉,可腊肉是重油重盐的腌制菜,想解馋,就得另辟蹊径。我把从老家寄来的腊肉,洗净后放热水里先漂一遍,去油去盐,然后捞出来炒菜,少放一点清油,改良后的这道菜成了全家人的最爱。孙辈喜欢吃藕,我就变着花样炒藕:姜末炒藕,边炒边放水,炒出来的藕鲜香脆;有时我先把藕片用盐渍一会儿,倒掉渍水,爆炒出锅,味道也很不错。

我有不少同龄朋友,因各种原因,不下厨房。有的闻不了油烟味;有的火、刀用起来不协调,容易发生事故;有的味觉不敏感,做出来的东西很难让人下咽,干脆放弃。其实,不下厨房,少了很多生活乐趣。

下厨房做饭,辛苦自不必说。可当一家人把大盘小碗全吃完,那种开心也是难得的。做出自家特有的味道,这其中有爱、责任和体恤。现在社会发展了,想吃什么都不难,可要吃出家的滋味,永远是最奢侈的消费。

我为子孙下厨房,年纪大了,有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,累了也想罢工。可当精力尚存时,仍想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,让家的味道充盈每个家庭成员,留下永远难忘的味觉记忆。